第一章 走出天府之国

一、广安一少年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有一颗日夜不停地绕着太阳运转，并充满着无限生命的小小星球，那就是人类居住的地球。

在地球的东方，有一块历史悠久的版图,那就是中国。

在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群山环抱，物产丰富,人们称天府之国的地方,那就是四川省。

在四川省会成都以东二百多公里、西南名城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有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积不小的名叫广安的县。

广安县地处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势为丘陵地带。这里青山绿水,土地肥沃,民风淳朴。

发源于大巴山深处的渠江,浩浩东去,穿过广安,在华蓥山麓经过几回曲折，在合川注入嘉陵江，继而在重庆汇入长江。

渠江被称为广安人的母亲河，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两岸百姓,滋润了沿岸的庄稼,还曾孕育过众多的志士仁人。

广安县城位于渠江边，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江边小城。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年代,这里除青石大路外,更经济更方便的交通就是水路了。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賨族人。賨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

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

巴族,远古时代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中叶战败于殷,便向殷纳贡称臣。到了商朝末年,巴人不堪屈辱,参加了周武王的伐商之战。巴师曾为前锋,剽勇善战。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封为诸侯。武王封其宗族中姬姓人士于巴，号为子爵。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南方大国楚国崛起。巴国在与楚国数度交战之后,终于战败,遂离开汉水流域,举族徙迁,最后落足于川东地区。

巴人与川东各土著民族融合，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巴国,直到公元前 316 年为秦所灭。

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时,宕渠改为始安,隋称賨城,唐代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

广安是一个大县,唐朝开元年间,当时的渠江县就已有人口一万八千余人。清代以来,广安人口陡增,到咸丰年间已有十多万人口。而到清末民初，广安县的人口数量又迅速增加，成为四川的一个大县。

据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叙述,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猪），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特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

广安人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衍繁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在广安的协兴乡牌坊村，有一户姓邓的人家。

户主叫邓文明，娶了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妻子，名为淡氏。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淡氏比邓文明大两岁,结婚后两人感情很好,相敬如宾。

1904 年,邓文明 18 岁,而他的妻子则是 20 岁。

这一年,一件喜事降临他们家。

原来,淡氏有喜,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农历 7 月 12 日,按公历来说,是 8 月 22 日,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婴长得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淡淡的眉毛,白皙的皮肤,眼睛却不大,另外还长了一个小小的鼻头儿。

这是当时千千万万个中国婴儿中很普通的一个。

邓文明夫妇俩不知道这个孩子未来的命运如何，但他们欢天喜地，因为至少邓家在他们这一辈可以传宗接代了。

在当时中国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浓厚的伦理观念,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生一个男孩传接香火,那是对前辈和祖宗最大的不孝，也是最无能的表现。因为女孩是要嫁出去的,只有男孩才能续接香火,传宗接代。

邓文明夫妇俩对生下的第一个男孩自然寄予很大的希望,给他取名为邓先圣,意思是能成为一个如同古代的圣人一样的伟大人物。

不过,有人不赞成取这个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 邓先圣 5 岁那年,邓文明聘请私塾教师来家教书发蒙。这个私塾教师有几分迂腐之气，认为取“先圣”之名未免太狂了一点。在他的眼里，二千年前的孔圣人尚且为‘圣’,而现在这个男孩怎么取名为‘先圣’呢 你再聪明，再有出息,也不会超过孔圣人了。况且,这也是对孔圣人的不敬重。

于是，这位私塾教师把邓先圣的名字改为邓希贤。在这个私塾教师的眼里,‘贤’虽比‘圣’低一个等级,但这个孩子如果能成为一个贤人君子，也就非常了不得了。

邓文明对此倒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很尊重这位私塾教师出的主意，同意将自己儿子名字由原来的先圣改名为希贤。这时在邓文明看来，圣也好，贤也好，只要孩子将来有出息，能光宗耀祖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 20 年，直到改名字为邓小平为止。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一年就过去了。邓文明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抓得很紧。当时中国的教育虽然落后，但人们却重视读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科举制成为人们改变出身和处境的好门路，在人们眼里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只要有条件读书，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的。

邓文明对自己的孩子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虽然儿子的名字由先圣改为希贤，但贤人也必须有知识文化水平才行。这样，在邓小平 6 岁那年，邓文明将他送进了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念书。

在私塾发蒙，学生跟着先生，读的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物。上了初级小学，在当时广安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学生们也只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

当时教师的传授方法，只是教学生识字，背诵。至于书中讲的是什么，教师一般是不作解释的。有时，教师自己都闹不清书中字里行间所讲的是什么。

只背诵不解其义虽不是科学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也有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好处。一个人小时候背住的东西往往可以记一辈子，而且背得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可以起相当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协兴乡的小学里实实在在地读了六年书。当他小学毕业，考入广安县高小的时候，已是 11 岁了，这是 1915 年。这时，他个儿也长了不少，而且成绩也很优秀。

当时，广安县只有一个高小。学校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山坡上，有一栋两层的楼房，砖墙瓦顶，二楼教室的外面有木板的走廊，用木头的栏杆围挡起来。教室不大，可以容纳二十来个学生。因为全县就只有一所高小，而且每次只收两个班的学生，所以进这所学校读书也不容易。学校的条件不是很好，自然科学的东西几乎没有。国文课除了孔孟经书外，还教授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有柳宗元的，有韩愈的。教学的方式，与初小一样，也主要是背诵。

当时高小的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已是二十来岁了，有的只有十一二岁。家不在县城的学生都在学校住宿。

邓文明的家在协兴乡牌坊村，离县城的学校有二十多里远。那时只能靠坐渡船过河，走石板路爬坡。邓小平在学校里上学，不可能天天回家，只能在学校寄宿。一般每一个星期回家一次。

这时的广安全县，不但只有一个高小，而且只有一个初级中学。

1918 年，邓小平 14 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安中学。此时的邓小平，在家里是一个受到父母疼爱的孩子，在学校里是一个勤奋学习的好学生。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邓小平考上广安中学，正准备好好用功学习一番的时候，一场波及全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兴起。

这场运动很快改变了邓小平以后的一生经历和人生命运。

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先对这场运动作点介绍。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20世纪初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清王朝一天天腐败衰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动乱接连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压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争。与此同时，一些仁人志士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多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在维新思想的影响和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一批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

于是，他们中一些人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留学。以后人数逐步增加，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热血青年纷纷出国学习。他们在国外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政治法律，学习军事，学习科学知识，观察外国的政情民情。

毛泽东描绘当时的情景时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留美的容闳。以后,留学生越来越多。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大批青年开始赴日本留学。我国一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青年革命家,如邹容、秋瑾、陈天华、黄兴等,不但在国外学习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在海外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更把海外当做革命基地，在日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到 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有留美学生八百余人,留欧学生则平均每年五百人,而以留日学生为最多,总数竟达到二万多人。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教育界和留学倡导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人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一些科学新说,也多出自法国,因此与其到日本学习,不如直接去法国学习。而且在欧洲诸国之中，法国生活费用相对低廉，对需远涉重洋而去留学的中国学生，特别是自费学生，比较适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育界逐渐兴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清末民初的

留法学生,其中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尤为著名。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为清末大学士李鸿藻。1901 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等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

吴稚晖,江苏武进人,系清末举人,曾任天津北洋学堂教习、上海南洋公学学长，曾留学日本。他是最早倡言俭学的人,当李石曾要去法国时,他叮嘱李石曾说 到法国后要‘注意苦学”。两年后，他本人因苏报案被迫流亡国外，到英国留学。

张静江,浙江省吴兴人,其父曾以 10 万两银为其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1901 年随孙宝琦任一等参赞。第二年开办通运公司,从事古玩、茶叶、丝绸买卖。后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以经商所得为同盟会提供活动经费。 1906 年,张的同乡褚民谊等人自费赴法留学,通运公司及其下属商店遂为留学生提供食宿、打工的方便,使公司如同管理自费留学生的机关。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和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甲午战后,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兼中国教育会会长等职。后游历日本，参与革命，发起组织光复会并被推为会长。1907 年,蔡元培获准自费到德国柏林留学。在留学期间，蔡元培虽受孙宝琦的赏识，月得津贴 100 马克,但仍不敷支用,因而不得不一边留学一边做工，以半工半读方式维持留学生涯。

1907 年,吴稚晖由英国转赴巴黎,继续过苦行僧式的俭学生活。他与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共居陋室,厉行节俭,将日常生活费用减至常人所贷之一半，每人每月仅开销房费 15 法郎,伙食费 60 法郎。李石曾留学法国期间，先后在蒙达尔纪农校、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攻读农科与生物学，遂与留法同人发起远东生物学研究会。[2] 他们应用近代科学研究手段，悉心研究大豆的营养成分，进行大豆食品开发。

1909 年，李石曾等人筹组了豆腐工厂，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去一批工人(俗称‘ 高阳华工 ’)。这些华工利用在豆腐公司做工的余暇时间,有组织地学习法语、国文和一些科学知识,形成了一种‘ 尚俭乐学 ’的风气。

后来,豆腐工厂的销路渐开,生产规模也渐渐扩大,工人由 5 人增至 30 人。同时，也有自费留法的中国学生投身豆腐工厂,进行半工半读。工厂的工人在工作之余,也由李石曾等人组织学习中文、法文及科学常识。

这样,无论是工人还是留法学生,在豆腐工厂中都是‘ 同窗同食,略如学校中共同生活之组织,每人每月饭费,40 法郎已足 ’。

可见，李石曾开办的豆腐工厂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先例，即以生产企业为依托，解决留法学生的住宿与生活来源，同时又可兼顾学生与工人的学习。

这种小范围的试验,无疑是成功的。不过,这种试验能否由点到面进行普及和推广,显然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否长期看好；二是取决于企业数量的

多寡。

此外,豆腐工厂进行的是中国式的手工操作,其工艺流程简单,技术要求不高,易为留法学生和中国工人所掌握。如果在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企业中工作,豆腐工厂中的留法学生和工人是否能适应,则难以确定。

1915 年夏天,李石曾又支持豆腐公司组织“勤工俭学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华工学校。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这种固定组织机构很受华工欢迎。有少数留法俭学学生也参加了勤工俭学会,除在华工学校就读外,也参加劳动,以其收入补贴生活费用。这使李石曾意识到,这种方式,既能解决求学问题,又能解决求学所需费用。于是倡议把勤工俭学这种方式推广到留法俭学活动中去,让大批知识青年到法国来做工,以做工的收入支付求学的费用,从而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实现留法的目的。

这样,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勤工俭学问题就正式提出来了。

到 1916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反对留法活动的政治障碍消失,于是中法文化交流事业又得以开展起来。

1916 年 6 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由热衷于两国文化交流的中法知名人士担任领导,并在法国巴黎和中国北京分设办事机构,蔡元培和欧乐先生(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分任中法两方会长。

华法教育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从中国方面说，华法教育会就成为民间经理旅法华人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机构。在华法教育会下,设有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以及华工教育等部门，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

从 1916 年到 1918 年，欧洲仍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笼罩之下。这时水陆交通遭受封锁或阻隔，虽然没有多少人能赴法，但蔡元培等仍在国内为实现大规模赴法勤工俭学而积极奔走。这期间他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在一些省市促成华法教育会分会的成立，作为该地区勤工俭学的主管部门;二是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使学生赴法前受到法语和劳动工艺方面的基本训练。

当初,这类学校主要有三所:长辛店留法预备班,附属于长辛店铁工厂内;留法勤工俭学会高等预备学校,附属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设在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

后来,又在北京开设了法文专修馆,在北京大学增设了留法预备班。

继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后,到 1919 年,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直隶(河北)、山东、福建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的分会，留法预备学校也增加到二十几所。上海还专门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集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地来沪候船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至此，全国性及地方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事机构在不少

省市建立起来了。

正在这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对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周恩来当时所分析的“: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们亲眼看到中国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正是由于有工人阶级的坚决支持和斗争，五四运动提出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巴黎和约”才得以胜利实现。不少知识分子从中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投身劳工之中，联合劳动阶级的力量。

“劳工神圣”这四个大字“;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当时的报纸描述这一新气象时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

这种新思想、新口号,彻底地否定了几千年来存在中国人头脑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和‘贵学贱工’的偏见。特别是当这种口号由自身是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们提出并传播开来时，就更具有它特有的重要意义。它说明青年们正在接受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影响。

当然，这可喜的变化，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指导密切相关。

当时，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发

展的趋势,号召青年们认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做迎接新社会降临的弄潮儿。他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庶民的胜利”,全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工人阶级战胜贵族、资本家。因此,他号召青年们“快去作工”,为使‘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这一活动中把自己改造成一代新人。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下，不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决心与工农相结合,选择了到法国去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

勤工俭学运动还得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组织。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在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渴望学习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由于反动统治者把俄国革命当做“洪水猛兽”,视马克思主义为‘邪说异端”,百般封锁、诋毁，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探索与追求造成极大困难。到苏维埃俄国去留学,一时又难以实现。为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学习世界新思潮,到接近苏俄的法国去,就比在国内更容易了解苏俄革命的情况，也可以亲身考察正在高涨中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于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决定借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大力发动和组织本地区的革命同志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前后,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工读主义”思潮,也对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四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的提倡,长期禁锢中国思

想界的闸门打开了。在西方流行过或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流派,大量传入中国。在“改革”“救国”的口号声中,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接受了“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有的受到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的思想影响，有的为空想社会主义描绘的理想社会所吸引，有的表示欣赏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工团主义……

以上种种思潮的汇合和撞击，在中国知识青年中形成一种“工读主义”的思潮,即希望用工读结合和学问与生计相兼顾的方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达到对中国社会实行改造的目的。

这种工读主义思潮风靡一时，不少青年人因为强烈要求改造社会,急于救国救民,便将这种实质上为空想和改良主义的“工读主义”,当成“救时良方”加以接受和实行。

他们在北京等地组织青年互助工读团,试验工读结合、自食其力的新生活。有的则积极筹备，要到国外去学习，去试验。他们的行动之不能成功是势所必然的，但青年们表现出的对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却促成不少人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

三、湘、川两省的留法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战争造成的交通封锁解除,海

路航运开通,乘船前往法国已现实可行。至此,可说赴法勤工俭学诸事皆备。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中国迅速兴起了。

据统计,1919 年全国有十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其中七批是在五四运动后启程的。1920 年又增加了十批,有近千名勤工俭学生赴法,达到了高峰。

从 1919 年至 1920 年的两年之内,全国就有近二千名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在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旅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这场运动中,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河南、陕西、贵州、直隶、奉天、山东、湖北、云南、山西、安徽、广西等省份共有 1600 多名青年赴法留学。其中湖南、四川两省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人才也最多。

湖南,是毛泽东、蔡和森的故乡。1918 年 4 月,毛泽东等人在那里发起成立了先进青年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打先锋的人"。

新民学会于 1918 年 6 月在长沙召开会员大会,专门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

会上,毛泽东对实行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意义和会友"向外发展"的计划,做了详细说明。会员们一致认为,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会后,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等三十多

人报名参加。新民学会决定由蔡和森“专负进行之责”,先去北京了解情况,做些准备。

不久,蔡和森肩负同志的重托,满怀希望地离开长沙北上,于6月25日到达北京。他开始频繁活动,会见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杨怀中教授,并与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接洽交涉。经多方联系、了解,他发现华法教育会对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不仅路费等经济问题没有着落,而且还硬性限定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借贷名额不得超过25人。

蔡和森立即将上述情况写信告知毛泽东、萧子璋(萧三)等人,指出“: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容收,成一大组织”。并希望毛泽东能率领更多的湖南青年来北京,认为“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在此期间,蔡和森与在湖南的同志频相书信往来,讨论勤工俭学问题。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说:“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要“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实情”,其目的“唯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毛泽东在复信中也提出:目前最紧迫的是必须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会友应有计划地或去俄国,或去法国,或留国内,以研究当前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他认为:“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